

從何所來，去何所至：《新聞業危機的再思考》

黃順星*

書名：*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 Professional Codes, Digital Future*

編者：Jeffrey C. Alexander, Elizabeth Butler Breese, & Maria Luengo

出版日期：2016年

出版社：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年HBO自製影集：《新聞急先鋒》（*The Newsroom*），在台灣首播後，至少在忝為「傳播學者」的筆者臉書上，看到不少學界同仁、媒體記者讚賞該劇的貼文。流暢的剪接功力、機智敏捷的對話，緊湊懸疑的劇情，向來是美劇誘人之處。但在戲劇之外，吸引台灣傳媒人士注目的，應該是《新聞急先鋒》編劇所訴求的是簡單明瞭，卻又不斷在現實中受挫的古典新聞理念。

千禧年後全球各地新聞媒體所遭遇的困境，都可在虛構的《新聞急

投稿日期：106年3月16日；通過日期：106年4月5日。

* 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舍我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

黃順星（2017）。〈從何所來，去何所至：《新聞業危機的再思考》〉，《新聞學研究》，131: 173-179。

先鋒》中一覽無遺。如何榮幸（2015.02.03）所述，第一季的《新聞急先鋒》：

充滿樂觀主義基調，描述一群不滿電視新聞綜藝化的主播、製作人與新聞團隊，積極捍衛新聞價值與尊嚴，儼然一副傳統媒體絕地大反攻的態勢。然而，這種新聞理想主義，卻在第二季急轉直下，這群優秀新聞人竟犯下嚴重新聞錯誤，英雄光環盡失；到了去年底第三季更是令人感傷，劇中電視台遭到粗鄙的網路大亨收購，傳統新聞人在社群媒體狂潮下進退兩難，儘管不缺良心與堅持，這場唐吉訶德式的戰役卻無比漫長。

劇情雖然是虛構，但對危機的感知，卻深刻地烙印在傳媒人士的日常例行工作中。新聞媒體從業者的危機感，更可從近來圖書市場不時出版關於報業危機、傳媒無效、思考媒體未來等相關論著中略知一二。這本由耶魯大學教授，也是該校文化社會學中心（Center for Cultural Sociology）主任的 J. Alexander 等人所編纂的論文集，從書名可知是本論述當前新聞傳媒危機、探索新聞業未來的學術論著。相較其他主題類似的英文學術著作，這本論文集的作者不獨美國學者，還包含來自英國、德國、西班牙、挪威與瑞典等地學者，從更廣泛多元的角度檢視當前西方新聞傳媒的發展困境。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危機的敘事，探討各地實務、學術人士，如何陳述新聞傳媒所面對的危機敘事。Breese 的論文以歷史的眼光回顧 1980 年代有線電視、實況轉播等技術被引進美國電視新聞，以及丹·拉瑟（Dan Rather）取代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成為 CBS 晚間新聞主播時，美國業界如何表述這樣的技術與專業典範的轉移。Larsen 以截然不同於英美媒體制度的北歐國家為例，檢視北歐的媒

體從業者如何論述與面對數位媒體的挑戰。Kreiss 則提示當前關於新聞媒體危機的敘事中，甚少思考在數位技術衝擊下，新聞業作為市民社會中公民質疑（civic skepticism）的制度性設置的存續與角色轉換。Nielsen 借用 Hallin 與 Mancini（2004）所提三種不同的媒體體系：民主統合（democratic corporatist）、極化多元（polarized pluralist）與自由（liberal）為架構，分析三種不同媒體體系中從業者所認知的危機（經濟、專業、信心）究竟為何。Schudson 的論文認為傳統印刷媒體的衰退勢所必然，但印刷媒體的衰退並不意味專業新聞的消失。在數位媒體的衝擊下，可以發現許多傳統媒體與記者試圖融合新舊組織文化的創新，數位新媒體並非僅具破壞傳統專業新聞的反動力量，傳統新聞業也從中獲益、更新。

第二部分是對數位新聞媒體的恐懼，以田野觀察、訪談等方法探究傳統媒體引進數位技術後對專業新聞實作帶來的轉變。Luengo 以美國紐奧爾良的 *The Time-Picayune* 為對象，分析該報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支持與反對雙方，如何透過專業新聞二元符碼的象徵鬥爭（symbolic struggle），使記者編輯更加地捍衛在數位轉型後媒體的公共性。Carlson 以紀錄片：*Page One: 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 為對象，分析各界如何論述紀錄片中所呈現的報業危機，藉由不同的反映與評論，揭露出傳媒危機是如何侵蝕新聞業的深層文化符碼（如客觀性、平衡報導等），以及從業者所設想新聞業該有的實踐準則。Anderson 的論文則是研究部落客如何從原先不被承認、且外在於主流新聞實踐的平凡世俗工作，到幾乎如今成為所有傳統新聞媒體皆須聘僱的成員。Usher 分析新聞媒體數位化後，最為人所詬病的即時性問題。這不但讓媒體工作者放棄傳統的看門狗角色，也使記者必須無時無刻地從事搶先報導的工作，隨時關注網站流量。

第三部分省思在數位文化的衝擊下，如何更新、重振傳統專業新聞價值。Ryfe 以美國西岸的線上新聞網站為例，說明傳統新聞專業價值是可以在數位時代持續更新。研究中的許多受訪者並未受過傳統新聞教育，或曾任職於傳統新聞機構，但所實現的職能卻毋庸置疑地是傳統記者角色的扮演。若僅將這些受訪者視為部落客而非記者，不但將受到他們的反擊抗議，顯然也忽視專業新聞價值在數位時代的修復能力。Revers 則將新聞記者面對數位媒體的挑戰視為一種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新聞專業主義的集體表徵提供從業者象徵性與實質性的力量，使其能夠在各種情境中專業性地行動。Dahlgren 以受惠於數位技術而於自媒體中蓬勃發展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是如何對傳統專業新聞的存續造成危機，雙方又如何能彼此修正而更有益於民主公共生活。

截至目前，讀者可能還無法領會本書與其他討論新聞、傳媒危機著作的差異。由 Osterag 所撰寫的最後一篇論文，明確地提出若要正確掌握當前新聞業的危機，必須以文化社會學的強綱領（cultural sociology's strong program）予以檢視。這個由 Alexander（2003／吳震環譯，2008，頁 14）所提，部分借鏡自愛丁堡學派的概念，認為必須將文化自社會結構的概念中予以分離且承認文化的自主性，並透過強綱領才能解釋文化在形塑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有力角色。人正是透過深層且持續性的文化結構及相關連的意義與感覺體系，成為具有能動性與動機的行動者。而且毫無疑問地，新聞業正是現代社會中傳遞這些文化意義與感覺的主要制度設置，於是關於新聞危機的討論應當是新聞業是否能夠繼續傳遞社群所共享的道德性，以及生產促成行動的情緒感覺。

Alexander 在引言中聲稱，許多主張是數位化技術或經濟衰退導致新聞業能否存續的危機論述，都是化約論（reductionism）。在化約論

中新聞被視為資訊，如此一來新聞也就真的只是一種技術。注定遲早會被速度更快、能夠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的資訊商品所淘汰。但如果新聞業被視為一門手藝（craft）與專業，那麼新聞業所能提供的就會遠遠地多過於機械式的紀錄與資訊傳送。換言之，無論是數位技術或網際網路，都不僅是技術更是敘事，是種被賦予具有行動變遷能力的文化結構。於是乎技術創新帶來的危機論述是文化解釋框架所建構而成的，關鍵在新聞業的文化允諾（cultural commitments）是否能夠相應地變化。

除了認定新聞業是市民社會中傳遞共享道德與情感的神聖專業（sacred profession）外，Alexander 還認為新聞業是市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公民建制（civic institution）；新聞業不只是專業倫理，更是公民道德（civic morals）。因為傳統新聞專業所珍視的公平性，同時也是公民身份的基本原則：例如強調與新聞事件、消息來源保持中立；在採訪中讓受訪者得以發聲；提供中立資訊使爭論雙方有折衷和解的可能。這些新聞專業準則的要求，不只生產一則則的新聞稿件，也有助於創造促成公民團結的道德論述。例如當前得益於數位技術下蓬勃發展的部落格，固然使訊息來源與意見表達更為多元，但事實上卻可能窄化使用者的資訊來源，形成排他的同溫層現象。這當然是當前新聞傳播的諸多危機之一，但 Alexander 相信在數位技術條件下，過往由獨立新聞機構所踐行的民主實踐，不但不會被削弱反而必須在新的技術條件下被接納。

在這樣的理論預設（新聞業是神聖專業、新聞業是公民建制），及以文化社會學的強綱領為方法的指引下，本書作者多將當前新聞業的危機視為透過敘事所建構而成的危機論述。建構不意味虛構，在真實世界中仍有其現實基礎，只是無法充分地決定。於是必須檢視新聞敘事如何與現實脫節，而危機的解除也有賴於建構新的敘事以符合現實，更遑論新聞業是市民社會中維繫社會團結、凝聚共享道德感的重要建制。但就

像《新聞急先鋒》的劇中人物，堅不透露消息來源而甘願入牢、從事新聞查證而捨棄獨家、拒絕媚俗不願引用社群媒體的訊息為新聞，無非都是基於傳統專業新聞準則的判斷，但又有何用？虛構的《新聞急先鋒》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為真實的故事不是勇敢的大衛戰勝歌利亞，而是唐吉訶德般的戲謔無奈。換言之，固然新聞業的危機是由敘事與論述所建構的，但顯然也無法不論及 Alexander 所批評的技術與經濟化約論的因素。例如在 Larsen 的論文中，就可發現顯然不同於英美的北歐公共廣播體系，在經濟營利、數位轉型上的不同對應策略，同時也讓北歐的媒體從業者對危機的感知不同於其他國家。

但本書對當下從事媒體數位轉型、找尋新商業模式的新聞專業人士而言，依舊提供值得深思的問題。Kresis 認為當下許多新聞媒體開始提供讀者具有更多堅實資料內涵、具備社會科學形式並以電腦化的資訊處理方法產製的新聞，藉以釐清選情趨勢、政策制訂過程，協助公民、讀者做出判斷。Kresis 及其他學者將這種以數字、統計與電腦為工具而生成的新聞，稱為「電腦化新聞學」（computational journalism）。這些透過電腦、統計、資料庫所生產的新聞，相當符合傳統新聞業對客觀、免除價值判斷等專業理念。但這種將新聞視為資訊所採行的轉型策略，顯然忽略新聞作為公民質疑建制的傳統新聞意涵，也就是新聞業之所以必要是在於對民主生活中產生對話的文化價值。當新聞媒體轉型時如果只思考如何以動畫圖像吸引讀者點擊，或以互動方式創造讀者新穎有趣的閱讀體驗，難免將落入 Alexander 所言，當新聞果真成為技術，那麼遲早會被更新、更快、更友善的使用者體驗的技術所取代，並且與公共生活漸行漸遠。

參考書目

- Hallin, D. C.,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何榮幸 (2015 年 2 月 3 日)。〈從《新聞急先鋒》到《皮諾丘》〉，《天下雜誌》，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4316>
- 吳震環譯 (2008)。《文化社會學：社會生活的意義》，台北：五南。(原書 Alexander, J. C. [2003].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三一期 2017 年 4 月